

On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o-translatology

ZHENG Chuany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inan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April 6, 2022

Accepted: July 6, 2022

Published: December 30, 2022

To cite this article: ZHENG Chuanyin. (2022). On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o-translatology.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4), 094–099, DOI: [10.53789/j.1653-0465.2022.0204.012](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2.0204.012)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2.0204.012>

Abstract: Translation is indispensable to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o render Chinese Classics into English and introduce them to the west is a vitally important commission of medio-translatology. Chinese Classics—the crystalliz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wisdom—convey the most prominent fine cultures of Chinese nations, reflecting the overall needs of humanity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civilization of world as a whole. With Chinese economy skyrocketing currently and Chinese international statue rising constantly, it is a must for Chinese Classics to go global and converge itself into the world civilization, serv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words: Chinese classics; medio-translatology;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Zheng Chuanyin is a lecture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direction is translation.

譯介學視角下的典籍英譯

鄭傳銀

淮南師範學院外國語學院

摘要: 翻譯是跨文化、語際交流的推動器。在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的引領下，譯介學的一項偉大的歷史使命是要把中國典籍推向世界。中國典籍源遠流長、廣博精微，是世界文化多元化必要的組成部分，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發展的重要內核。在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的背景下，典籍的譯介具備了一個絕佳的時機，同時典籍的對外譯介又必將會為中國經濟進一步的發展奠定基礎。

關鍵詞: 典籍；譯介學；典籍英譯

基金專案: 淮南師範學院 2018 校科研專案：5C 核心素養理念下《綜合商務英語》教學高效性探究（專案號：2018hsjyxm45）。

一、典籍與譯介學

(一) 典籍

典籍,根據《現代漢語詞典》(第280頁)是指:「記載古代法制的圖書,也泛指古代圖書」。

《辭海》(1999年版上卷第831頁)把「典籍」定義為:「國家重要文獻。《孟子·告子下》:『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趙岐注解到:『謂先祖常籍法度之文也。』亦統稱各種典冊、書籍。又《尚書序》稱:『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後漢書·崔寔傳》說寔『少沈靜,好典籍』」。顯然,「典籍」主要包含兩個義項,一是古代重要文獻、書籍;二是法典、制度。當前,典籍主要是指歷經時代洗禮,穿越時空至今被公認是承載中華民族文化的一切文獻的總稱。這些文獻從不同角度反映我國有史以來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軍事、醫學、農業等各方面所取得輝煌成就,為中華民族的源遠流長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因而,典籍是時代的縮影,是文明的積澱,是古代人民智慧的結晶。解讀典籍得以讓我們、讓世界認識中國古人的智慧,讓典籍中的智慧煥發出新時代的光芒;學習和譯介典籍既能傳承民族文化的精髓,又能使當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各領域的發展找到歷史淵源,並促進其發展。

(二) 譯介學

謝天振教授認為:「譯介學最初是從比較文學中媒介學的角度出發、是從比較文化的角度出發對翻譯(尤其是文學翻譯)和翻譯文學進行的研究。」(陳惇,孫景堯,謝天振,1997:137)「譯介學是以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與跨學科為比較視域而展開的異質文學互動研究」。謝教授的《譯介學》專著所說的譯介學「關心的是翻譯(主要是文學翻譯)作為人類一種跨文化交流的實踐活動所具有的獨特價值和意義」,本質上是「文學研究或文化研究」,也可以看成「整體翻譯研究的一部分」。(謝天振,2013:1,9)換言之,譯介學既是一種翻譯研究方法,又是一種比較文學研究方法。譯介學的主要思想之一就是「創造性的叛逆」,通過這種措施,民族的文化才能更好地走向世界。對於典籍英譯來說,「創造性的叛逆」之「創造性」是典籍煥發新時代生命力的重要途徑,但是其「叛逆」必須要保留典籍的文化主體性同時又要遵循語言的「入鄉隨俗」,達到譯介活動的「共贏」局面。

二、典籍英譯

世界的格局應該是多極的,而非一極的、單極的;作為軟實力的文化因素,是經濟發展維繫的紐帶和粘合劑、潤滑劑。隨著經濟發展全球化趨勢的加劇,文化全球化是歷史之必然。作為文化因素中精粹的典籍的翻譯和推介是實現文化多元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對典籍的譯介,世界將更瞭解中國,這將使得中國文化在走向世界的同時煥發新的活力。但是,為何要對典籍進行譯介?如何才能更好地讓中國典籍走出去?

(一) 典籍本身生存、發展的必然訴求

典籍是一個民族、國家的瑰寶,是世界文明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而對文明的共用是人類共同發展的本真訴求,同時典籍所承載的文明是人類進步的必要動力。典籍,一方面是個體在某一時期的傑作,另一方面更是其所在時代智慧的結晶,典籍能夠反映一個社會的傑出方面。典籍所承載的文明是一個民族和國家



文化的集中體現,所以只要典籍依存,文化和文明就不滅;文化不滅,民族和國家的精神將永存。例如,《道德經》反映著人類與自然界的關係,折射出中國古人對自然存在奧秘的洞悉和總結「推天道以明人事」無窮智慧;《史記》在記載著中國古代帝王將相豐功偉績的同時,也反映當時老百姓的真實疾苦是幾百年社會的一面鏡子;《紅樓夢》表面上雖是反映四大家族的興衰,但實際上反映的是當時社會的民生百態;《聊齋》流露著當時貧苦百姓在無奈的社會背景下的美好願望,希望能有一種超自然力的存在為大眾蒼生的生存帶來希望;《西遊記》反映當時官場盤根錯節之怪相,進步人士勇於反抗的鬥爭精神和市井布衣的無奈之歎;《本草綱目》呈現了人與自然渾然一體的哲學智慧「天生萬物以養人」,揭示了人與自然「和諧、天人合德」的樸素理念,取之于自然、用之于自然的理念至今都是我們人類與自然關係認識之楷模。故而以《本草》為代表的中醫典籍反映的是人類生存之要道:「道法自然」「陰陽調和」「生與共生」。它既是醫病救人之有效療法,又是人與自然融洽智慧的體現,是科學的醫學,更是智慧的哲學。

在漫長的「西學東漸」過程中,優秀的中國文化一直處於被動地接受地位。許許多多關於西方政治、經濟、科學、文化的文獻不斷地被引介到中國,被中國人吸收和運用,推動了生產力,提高了中國人民對世界的認知,是極為利好的現象。但是由於種種原因,悠久燦爛的中國文化典籍卻很少被世界所知。有統計顯示「從 1900 年到 2000 年的 100 年間,中國翻譯的西方各類書籍近 10 萬種,但是西方翻譯中國書籍的種類還不到 500 種」(汪榕培,王宏,2009:2)。這是與當前中國經濟地位和國際影響力是極不相稱的。對於中國文化自身來說,要生存發展,要立於世界民族文化之林,就必須要通過文化的譯介與世界交流,因此對中國典籍的英譯是必不可少的,對典籍的翻譯研究一方面利於提高我們自身對中國文化的認知,另一方面又可以豐富世界文化的多樣性。

(二) 中國經濟發展和大國國際責任的必然訴求

上世紀 80 年代以來,中國經濟迅猛發展,綜合國力日益強盛,尤其是當前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的踐行背景下,中國的大國形象日益彰顯;因此,西方世界也渴望更多地瞭解中國以及中國的傳統文化;同時,整個人類社會在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各種社會矛盾也不斷凸顯並激化,人類危機不斷加深,中國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可以幫助人們找到智慧和出路;此外,隨著中國大國影響力的日益提高,我們更加注重對外傳播自己的傳統文化,要求「走出去」的願望愈加強烈,這些都給典籍的外譯工作帶來歷史契機。作為對經濟的反哺作用,中華典籍中包含的文化底蘊可以加深經濟發展的內涵,並提供發展動力。

(三) 文化、文明存續、發展的必然訴求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中國典籍歷經幾百年甚至是數千年,穿越時空、社會、文化和種族家園,至今依然存在的根本原因在於其韌性和價值的普適性,在中華文化源源不斷的千年發展中,典籍的貢獻是不可或缺的,典籍是文化發展和智慧的結晶,也是文化發展的重要內容。同樣的一本典籍,因時代不同、譯者身份不同,被解讀時的側重點自然就不同,而且不同的時代也會豐富典籍的內涵,打上時代的烙印。每一次的翻譯都是在無限地接近和反映原著真相的嘗試,譯者的受教育程度、文化傾向、社會環境以及價值觀念等都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其對典籍的理解和翻譯,所以譯者對典籍的重譯、複譯既可以填補空白、拓展思路,又可以使典籍融入新時代、獲得新的生命力,所以典籍通過重譯、複譯可以再次煥發生命力,例如《論語》《道德經》等中國典籍的譯本也是層出不窮,同樣外國的著作如《哈姆雷特》等典籍也是有多種譯本。

(四) 世界文化多元性發展的美好訴求

文化多樣性是世界文明的基本特性,「人類文化的多元性猶如自然界的生物多樣性一樣必要」(汪榕培,

王宏,2009:3)。雖然在人類社會長河中,特定時期的文化有主流和非主流之別,但整體來看則是多元並存。奈斯比特(J. Naisbitt)和阿博頓妮(P. Aburdene)在他們《2000年大趨勢:九十年代的是個趨向》中指出:「人類越強烈地感到大家居住在同一個地球上,就越需要各種文化具有各自的傳統特點。品嚐別國的美味佳餚,穿牛仔褲,享受一些相同的娛樂,這些都是值得嚮往的。但是,如果那種外在的演變開始侵蝕深層次的文化價值,人們就會回過頭來強調他們的特色,這是一種文化反彈現象。每一個國家的歷史、語言和傳統都具有特色。有趣的是,我們彼此越相似,就會越強調我們的獨特性」(奈斯比特,阿博頓妮,1990:46)。

通過譯介,把中華民族特有的包含文化精髓的典籍翻譯成外語,讓整個世界都認識中國,讓中國文化參與全球文化交流,並為全球治理貢獻智慧。世界文化的多元性是不能缺少中國文化的。譯介作用的發揮可以讓中國的典籍思想成為世界人民的精神食糧,既有利於人類文明共用,又可以弘揚我們自己的民族文化,達到雙贏的目標。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縱深發展,文化傳播與交流的訴求更顯強烈。通過文化交流,互惠的經濟活動得以穩定和持續,因為文化具有極強的穩定性和持久性,同時文化是經濟發展的軟實力。在文化影響力的作用下,一次性或短暫性的經濟活動可以持續存在並發展強盛,造福子孫,所以在這層意義上講,中華典籍的譯介是間接地服務於全球經濟的發展,典籍的譯介也是經濟建設重要的內容之一。

三、何以譯介

(一) 從譯介學(Medio-Translatology)理論看,「譯」是手段,「介」是目的

從「譯」的角度來看,首先要處理一個二元對立的問題,即在源語和目標語之間尋求一個平衡點;這個點既能傳遞源語的真諦,又要適合目標語讀者的認知水準即習慣,否則譯者的工作很可能是徒勞。作為譯者,在從事翻譯,尤其是典籍翻譯時,心中總有其特定的物件,即受眾。魯迅先生曾經對譯文讀者進行過劃分,一類是「很受了教育的」,一類是「有略能識字的」,一類是「有識字無幾的」。(當然現在由於時代不同和世界科技文化水準的大大提升,這種劃分有待精細化。考慮到實際情況,本文作者認為第一類相當於現在的專家學者群體,第二類相當於普通學者群體,而第三類則相當於受教育程度很低的群體)。在這三類群體中,第三類的群體基本屬於「讀者」範圍之外,對於他們可以用圖片、演講、戲劇以及影片等直觀形式進行啟發和循循善誘;但對於第一、二類群體也不能採用同樣的文本,應該提供與之層次相當的文本;對於第二類群體最好對典籍使用改譯法,甚至是創造翻譯法;而對於第一類群體,無論如何,最好是採用「寧信而不順」的翻譯策略,因為這類群體可以為了研究而容忍一定程度上的「不順」。所以,在處理典籍翻譯時,只有充分考慮到讀者群體不同層次水準,通過「創造性的叛逆」能做到「量體裁衣」式的措辭,並且選擇適當的傳播形式,使得中華典籍做到「雨露均沾」。

從「介」的角度來看,「介」的物件具有不同文化層次的,「介」的途徑也是可以多樣化的。典籍的英譯從宏觀角度來看可以有三種策略。一、進行學術翻譯,注重典籍的學術價值,如《中華大文庫》類的重大翻譯專案等;這個層面上注重突出文化身份的主體性。二、進行科普翻譯,注重文化文本可讀性、趣味性和大眾化,如用電影劇本、中國故事等;這個層面注重文化通俗性和多樣性。三、進行「降維」翻譯,從影響外國兒童開始,兒童時期形成的或獲得的意識形態將是影響終身的;這個層面的典籍翻譯要側重譯語的簡單易懂、趣味性強,將典籍「創造性」地編譯成兒童的睡前讀物,猶如中國的孩子們閱讀《白雪公主》《灰姑娘》等經典讀物,這既可以影響外國小朋友,同時又可以影響這些小朋友的父母,一舉多得,這是中華文化「潤物細無聲」傳播發展。

(二) 譯介媒體多樣化

隨著科技的日益進步,資訊傳播的媒介呈多樣化發展,有廣播、電視、報紙、期刊、雜誌、互聯網、自媒體、新媒體等。尤其是在互聯網大資料時代,資訊日新月異,瞬息可達,資訊流在數量和速度等方面遠超常人想像。在傳播過程中做到多管齊下,全方位,無死角,全天候多類型即時宣傳報道。可以利用電臺如CRI(中國國際廣播電臺)開辦傳統文化欄目,可以利用電視如CGTN、CCTV News、法語頻道、西班牙語頻道等創辦精彩電視節目,可以利用如China Daily、Today China、Beijing Review、Shanghai Stars等報紙期刊等專設傳統文化欄目如Chinese Story、Chinese Unique或Album of China等等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專欄。尤其可以利用強大的互聯網平臺建立傳統文化網站定期發佈更新文化資訊等。多層次、多形式的文化節目和多種媒介的廣泛使用,能夠最大程度上增加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曝光率,使世界人民都沐浴在中國傳統文化裡。這種強大的外宣模式一定會對中華典籍的傳播以及中國大國形象的樹立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

(三) 提升譯者專業技能和綜合素質

典籍傳播中,「譯」是關鍵,只有將典籍先進行高品質的英譯,才有將其向外介紹的可能。再好的典籍如沒有譯者的貢獻都將無法逾越語言和文化的鴻溝。所以,譯者在典籍譯介中起關鍵性作用,通過譯者的工作,不同語言之間可以進行形式轉換、意義互通、可以彌合文化習俗的差異。譯者在此過程中擔任著守門人的角色,一定程度上又充當著仲裁者的角色。一個合格的譯者是要具備多種素質才能堪當典籍英譯的歷史重任,首先譯者要精通兩種語言;其次,譯者要諳熟兩種文化並具有敏銳的跨文化嗅覺;再次,譯者要具有強烈的責任心、使命感和正義感,不能以個人喜好歪曲或扭曲文化內涵,不能為了個人利益放棄歷史使命。唯有如此,中華典籍才能在異域邦國開枝散葉,長興不衰,澤被東西。

另外,縱觀對中華典籍英譯的歷史來看,其絕大部分都是由母語非漢語的外籍人士或寄居海外多年的愛國華人完成。由於生活背景、文化傳統、生活習慣的不同以及語言差異等重要因素影響,他們在解讀中國典籍的時候難免會出現一些理解方面的差錯,造成文化誤讀現象。所以,對於中國典籍的譯介,筆者認為主要由中國譯者完成更為妥當,因為中國譯者在翻譯時能夠從更全面的角度來分析和考量典籍文本以及典籍文本所涉及的多領域因素,能夠從整體上把握典籍文本,能站在歷史的傳遞者的角度進行典籍翻譯,使典籍一脈傳承。而非像一些外籍譯者,由於種種原因,對典籍割裂翻譯或抽取部分翻譯,從而破壞了典籍完整的生態,不能全面地表達中國典籍的深層次內涵。但是,典籍譯介又需要外籍人士參與。當典籍文獻經中國譯者完成後,請外籍人士對譯完的作品在語言方面進行潤色,起到錦上添花的效用。

四、結論

由此可見,把中國的典籍翻譯成外語並推介出去是中國典籍發揚光大的必要環節,也是中華文化和智慧對世界作出貢獻的重要一步。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國典籍的「譯」和「介」肩負著實現世界文化多元化發展和文明共用的雙重使命。一方面,對中華典籍的翻譯關乎中華文化的延續和發展;另一方面,它有利於實現世界人民對美好精神生活的追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新時代分翻譯工作者們,有責任致力於這項偉大而艱巨的使命,深思探究,筆耕不輟,薪火相傳。

注釋

① 霍躍紅:《典籍英譯:意義、主體和策略》,《外語與教學》2005年第五期,頁52-55。

- ② 譚曉麗:《和而不同——安樂哲儒學典籍英譯研究》,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版。
- ③ 汪榕培,王宏主編:《中國典籍英譯》,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 ④ 謝天振:《譯介學》,譯林出版社2013出版。
- ⑤ 楊平:《20世紀〈論語〉的英譯與詮釋》,《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2009年第10期,頁21-32。
- ⑥ 葉敏穎:越劇「走出去」的翻譯規範探究——以《越劇:梁山伯與祝英台》為例,《亞太學刊》,2022年第2期,頁40-46。
- ⑦ 李雙雙:西爾科的世界主義理想:《沙丘花園》中的共同體書寫,《亞太學刊》,2022年第2期,頁32-39。

(Editors: LENG Xueyuan & JIANG Qing)